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97(2008)01-0115-05

# 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

## ——中华龙的定位

庞进

(西安日报社, 西安市 710002)

**【摘要】**本文从“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四个方面,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中华龙的定位问题。对“弃龙”风波中提出的“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的区别”、“龙的传人说的由来”、“如何看待龙曾象征帝王皇权”等问题,也做了必要的阐述。

**【关键词】**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

所谓中华龙的定位,就是对中华龙文化做一个整体上的认知。我的表述是这样的:对中华民族而言,龙是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对人类文明而言,龙是智慧晶体、和世良方。

### 一、广义图腾

图腾是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与自然崇拜、族祖崇拜、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对后世文化影响很大。“图腾”一词,源自北美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Totem”,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崇拜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作为书面用语,“图腾”一词最早见于1791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学者龙格所著名为《印第安旅行记》一书中,1903年,严复先生在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斯的《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一书时,首次把“totem”一词中译为“图腾”。此后,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图腾概念和图腾理论,并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有图腾现象。

最早用图腾理论分析龙的学者是闻一多先生,他在《神话与诗·龙凤》中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sup>①</sup>

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闻一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图腾说”,即认为龙“是一种图腾(Totem),

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sup>②</sup>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些当代学者仍坚持龙图腾说。如何星亮:“龙原是一种图腾,但它又与其他图腾有区别。它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sup>③</sup>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sup>④</sup>“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sup>⑤</sup>

到了世纪之交,王东先生提出了“源于图腾,超越图腾”说,即:“龙的本质在于,它源于原始图腾、综合图腾,但又从根本上超越了任何一种原始图腾、综合图腾,从基于狭隘血缘关系的氏族文化象征,升华飞跃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sup>⑥</sup>此说具有创建性,“有助于启迪我们既注意中国龙文化与原始图腾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更注意探寻龙的深层本质所在,即龙从氏族部落的文化象征走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真正奥秘。”<sup>⑦</sup>

以前,鉴于学术界的争议和考古材料的不足,我对龙是否是图腾持谨慎的态度,著述中多用“图徽”、“图章”,而未用“图腾”一词。现在看来,有必要提出并强

收稿日期:2007-12-15

作者简介:庞进(1956-),男,陕西西安人,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

调“广义图腾”这一概念。

“广义图腾”是与“狭义图腾”比较而言的。依据中外学者对图腾现象的考察和总结，构成图腾的基本要素有：(1)某种自然物(以动物为多)或天象；(2)这种自然物和天象被认为与族祖、族人具有血缘关系；(3)是部族的保护神；(4)是部族的徽号标志。四条全部符合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图腾，部分符合者即为宽泛意义上的广义图腾。

以此考量，首先，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鱼、鲛、猪、马、牛、鹿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它虽然不是某种自然物或某种天象，但却是诸多自然物和天象的容合；其次，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文献资料中有伏羲是雷神之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描述(见《帝王世纪》、《诗含神雾》)，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之说——蛇是龙的容合对象，“蛇躯”即“龙躯”；有炎帝是其母女登感神龙首而孕生(见《帝王世纪》)、黄帝是其母感大电光而生(见《河图稽命征》)的记述，故可认为，在先民的心目中，龙与中华先祖有间接的“血缘”关系；再次，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土的龙已有好多件，这些龙或摆在原始村落广场中央，如距今8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石块堆塑龙；或置于氏族首领身边，如距今6400年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塑龙；或放在重要人物的头部，如距今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作为部族保护神和徽号标志的用意已很明显。至于祭祀礼器上的龙纹、部族旗帜上的龙纹等等，更是或多有出土，如商周青铜礼器上的龙纹；或已见于文献记载，如“交龙为旗”(《礼·觐礼》郑玄注)等。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如果说龙作为中华先民崇拜的狭义图腾不是完全有理由的话，龙作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广义图腾却是够格的。

其实，后世以至于今天，人们理解的图腾已与原始意义上的图腾有所区别，只要具备徽号标志的意义，似乎都可以称为图腾。说来这大概与严复先生翻译时所选的“图腾”这两个字有关。因为任何自然物和天象都是有形象的，这便与“图”，即“用绘画表现出来的形象”相吻合；“腾”有“升到空中”之意，既然是本族团的徽号标志，就理应受到高举、尊奉、敬重。

## 二、精神象征

要讨论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问题，得首先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们先看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薪火相传、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sup>⑧</sup>

“数千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光彩夺目、普照人间。诸如‘天下为公’的尚公精神；‘发奋忘食，乐以忘忧’、‘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和民族气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崇尚仁义，厚德载物’的雍容大度、包容万物的宽容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精神；‘刻苦自励’、‘头悬梁、锥刺股’的勤学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sup>⑨</sup>

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概括为：“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sup>⑩</sup>

对龙的精神，也有一些经典的表述，如：“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龙文化首先体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龙的形象，最初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舞龙和赛龙舟都需要运用集体的合力来完成，而无法运用单个人的力量去运作。在这种集体的合作中，如果单个人的力量不能融入整个集体的节奏中去，所有人都会招致失败”；“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龙文化，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真理”。<sup>⑪</sup>

还有，中国龙“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有形式，通过复杂多变的艺术造型，蕴涵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四个基本观念：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三是阴阳交合的发展观(或叫变易观)；四是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在这四大基本观念的后面，“最为深层的思想底蕴，则是龙的精神，是龙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以大综合的手段，求大和谐的目标。用孔子晚年《易传》中的两句话来表达，这种基本精神就是经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的两句话、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或许我们用多元文化综合创新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多元一体，综合创新。”<sup>⑫</sup>

笔者曾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来概括龙的精神，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八个字可以将上述对民族精神、龙的精神的概括都包容在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 三、文化标志

我们说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主要有三条根据：

第一，龙标志着中华文化的起源、雏型和成型。

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多方位、多地点发生的简单、粗糙、质朴的原龙；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化的雏型期，这个时期出现了进一步容合的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是中华文化的成型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基本定型的粗犷、雄健的飞龙。没有哪一种动物或神物能够像龙这样参与、伴随、见证中华文化从起源到形成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要给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寻找一个标志物的话，非龙莫属。

第二，龙可以标志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一般认为，儒道两家的学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龙的精神底蕴与儒道两家学说的精髓有内在的一致性，故可以作为这两家学说的标志。比如，容合是龙的排在首位的基本精神，而儒、道两家的学说都是容合的结晶。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就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先进》)，“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能行五者(笔者按：即恭、宽、信、敏、惠五种德行)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多种阐释，显然是一个体现着容合精神的概念。道家的核心理念“道”，也有宇宙的本原、本体，万事万物的规律，自然变化过程等多种解释，如认为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道是万物之所然也”(《韩非子·解老》)等，显然也是一个容合性概念。

第三，龙可以标志中华文化的现在和未来。

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智慧系统，当今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龙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它不但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的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

从龙的内涵意指来看，龙也经过了从最初的自然神物(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喻比人杰)和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祥瑞征三个阶段。随着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华龙也必然要走向世界，在未来人类文明大厦的构建中，中华龙作为“智慧晶体、和世良方”，发挥的作用将是无可替代的。

应当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卡，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图像徽帜。民族文化形象标志的形成有不同的途径，形成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一旦形成，就具有凝炼性、恒久性和不易(不宜)变更性。中华民族创造和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形象标志，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岁月，它凝结、寄托着历朝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其产生时间之久远，认同人数之众多，都是世界其他民族不可比肩的。

谈龙的中华文化标志问题，不可能不涉及“弃龙”风波。

2006年12月4日，上海《新闻晨报》刊登的一则报道称：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领衔的“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这个课题如果完成，中国形象标志将有可能不再是“龙”，他们所塑造的国家新形象标志，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消息一出，舆论大哗，一天之内，近20万网民参与有关网站举办的民意投票，九成多的人明确表示反对。网上文章多不胜数，其情绪之愤激，语词之尖刻，大有千夫所指、万众共诛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吴友富教授赶快于当日下午向媒体表明：“自己此前从未就此事接受过媒体采访，所谓龙不再作为中国形象标志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并强调：“中国龙的形象一定要坚持！”<sup>⑩</sup>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树欲静而风不止”。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广大网民对民族文化标志的强烈认同，对放弃本民族的文化精华，以迎合、迁就西方语境的言行的理智的批评与愤慨的指责，的确都让我们感动，而在讨论中提出和暴露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并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有必要迎合西方吗？

言“龙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容易招致误解”，因而应该放弃的言行，并不新鲜。此前，北京奥组委一些人就以“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为由，不顾大多数国民意愿，也不惜伤害海内外华人感情地将龙排除在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之外。

这些“弃龙”的说辞和做法，形成了一种现象，表面上看似是对一个文化符号不够重视的问题，而其本质则是反映出了中国在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些国人的媚外心理。按说，某些西方人有“不同的理解”或“误解”，要做的工作是向他们讲清我们的道理，消除误解，即使一时消除不了也没关系，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就是了，大可不必迁就和迎合。

在对外交往中，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生活中的道理常常是：站不起来，是因为自己跪着。在文化问题上，尤其是民族形象标志问题上，既不可以用东方的讲究来要求西方，也不可以用西方的说法来框范东方。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各种文明都有它的优良，全球化绝不是一种文明的一元通吃，而是各种文明的多元容合。

第二，中国龙与西方 Dragon 的区别何在？

“弃龙”风波的直接原因是有人将西方的 Dragon 与中国龙相混同，而两者无论从起源、形象、文化背景，还是功能、地位，都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象征物，是不可混同的。

西方的 Dragon 是对鳄、蛇、鹰、蝙蝠等少数动物的集合，具有喷火、吞人、破坏、护宝等神性，表象丑陋，主要代表恶，可以说“充满霸气和攻击性”。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 Dragon，这条 Dragon 就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国龙是对蛇、鳄、鱼、鲸、蜥蜴、猪、马、牛、鹿、虎、熊、鸟等许多种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多种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表象神奇，主要代表善，少有所谓的“攻击性”。如以尾划地、协助大禹治水的应龙。中国龙有神圣威严的一面，更有和悦可亲的一面。

西方的 Dragon 有海洋文明的背景，是暴力和邪魔之怪，由此产生了许多英雄屠戮 Dragon 的传说，如英国的圣乔治就是一位战胜 Dragon 的英雄；中国龙主要以农耕文明为背景，是水利和农业之神，由此产生了许多祈祷龙神以求风调雨顺的习俗，如过“二月二龙抬头节”等。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中国龙经过长时间的集合、演进和升华，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巨大的、无可取代的。

龙与 Dragon 相混，很大成分上是过去的误译造成的。所以，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曾郑重建议：将 Dragon 直译为“劫更”，或“劫根”、“拽根”，将龙英译为“Loong”(拼音 long 英文发“朗”音，所以要多加一个“o”，且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以示区别。

第三，中华儿女非“龙的传人”吗？

其实，对“龙图腾”以及“龙的传人说”的挑战，早在风波之前就已经展开。

先是作家姜戎在《狼图腾》一书中提出了“龙图腾极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演变而来”的观点。对此,我在西安图书馆举办的“天禄讲坛”上,曾郑重地予以回应——

狼有可能成为古代某些游牧民族的狭义图腾,也有可能进入龙的多元容合过程。但是,说龙图腾由狼图腾演变而来,文献证据缺乏且没有来自考古的实物证据的支持。至于《狼图腾》书后提的几条“证据”,均因判断有误而难以成立,最多只能算作一种猜测。所以,狭义的狼图腾不可能取代广义的龙图腾,就像人的一个指头不能代替一个人那样。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伴随、见证、标志了这个过程。龙的传人主要指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因遗传。中华始祖的文化精神与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同一。对古代一些游牧民族所崇尚的所谓狼的强悍进取、不屈不挠、团结合作等精神素质,龙自然也会采取容合的态度,使其变成龙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龙的精神中已包含有上述精神。所以,总体上说,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而非狼的传人。

之后,黄守愚先生又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sup>⑤</sup>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此,我也做了回应——

猪是一种具体的动物,将其再神化,也脱离不了作为自然界具体动物的生态特征;而龙则是容合了众多动物和天象的神物,它来自自然物又超越了自然物,其神性、神职之大、之多,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自然物所不能比拟的。不错,中国古代的确有过对猪的崇拜,东北红山文化区域内也出土了不少猪型原龙。但是,这些只能说明猪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而不是“惟一”。

显然,黄先生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猪崇拜的问题,而在于拔高了猪崇拜,将作为龙的容合对象之一的猪,以点代面、以枝节代整体地高抬到可以取代龙的地步;将中国古代属于局部性、一般性的猪崇拜现象,高抬到全局性、标志性的民族信仰和精神象征的位置;甚至将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黄帝、夏禹等诬指为猪,其牵强附会、轻率荒谬之处比比可见。其“论述”,乏见理论创新之功,却有混淆视听之嫌。因而,其说动摇不了龙图腾的崇高地位,中华民族只能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猪的传人”可以休矣。

黄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龙的传人”只有三十年的观点(“弃龙”风波中也有人讲在史书中找不到“龙的传人”一说),对此我也做了阐明——

“龙的传人”作为概念,的确是将近三十年前(1978年12月),由台湾音乐家侯德健通过《龙的传人》一曲,首先唱出来的,但作为观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伏羲女娲是传说中的神话英雄,也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生着长长的龙尾,而且亲密地交缠在一起。文献资料中也有伏羲是雷神之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描述[见《帝王世纪》、《诗含神雾》。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态,雷声为龙之发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和“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王延寿《鲁灵光

殿赋)]]之说。至于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唐尧、夏禹等先祖,与龙的关系就更亲密了,他们都有龙之称、龙之比、龙之功、龙之誉。正因为龙以象征物的面目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所以普天下的中华儿女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在这次“弃龙”风波中,有的媒体也把神话学家叶舒宪提出的“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sup>⑥</sup>的观点搬了出来。这样的观点我依然不能认同。史籍曾载“黄帝号有熊”、“轩辕出自有熊之国”,东北红山文化区域也出土有5000年以前的“熊型原龙”。我也认同叶先生讲的熊有“自我复生的能力”的观点,但说“熊图腾要比龙图腾悠久得多”、“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东北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8000年的石块堆塑龙,这条龙就一点都不像熊,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400年的蚌塑龙也与熊的形象相去甚远。至于个别人提出的“熊猫传人说”、“狗的传人说”、“羊的传人说”、“蚯蚓传人说”等,因离谱太远,不必细说。

第四,如何看待龙曾象征帝王皇权的问题。

“弃龙”者声言要“弃龙”的一个主要论据便是龙曾是帝王皇权的象征。

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曾是帝王皇权的象征,也的确起过为专制统治壮胆效力的作用,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批判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

(1) 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帝王皇权要早得多。

(2)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3) 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4) 帝王对龙的垄断,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称龙、用龙,如三国时的诸葛亮、魏晋时的嵇康比称“卧龙”,宋时的李公麟别号“龙眠居士”,江南胡某将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见龙”等。

(5) 元、明、清三朝对龙纹做了垄断,但这样的垄断:第一,只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则没有垄断;第二,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并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第三,真正因龙纹而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sup>⑦</sup>

(6) 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昇、影响力的扩大及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龙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

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等。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择优认同，有扬有弃，弘扬正面的积极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简单、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经认识清楚的负面内容不放。

#### 四、情感纽带

自龙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的那一天起，龙就同时具备了情感纽带的作用。正如钱其琛先生所言：“在中华民族诞生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繁衍生息在共同的区域，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就产生了共同的文化标志及其强烈的认同感。”“海内外华人都会认同中华文化中龙与凤的文化标志。这些形象很容易唤起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sup>①</sup>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还有夏禹等，是中华民族创世纪英雄。这些神话英雄，大都有作为历史人物的实在依据，但更重要的是人文方面的意义：他们使一个民族有了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共同的文化始祖、共同的精神母题。在神话传说中，盘古成龙相，伏羲为龙种，女娲具龙性，炎帝乘龙兆，黄帝黄龙体，颛顼乘龙游，唐尧应赤龙，虞舜得龙图，夏禹是虬龙，这便构成了普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的“人文根据”。这样的根据，使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文化象征，共同的图章徽记，哪里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哪里就有中华龙矫健的身影；说汉语的人走到哪里，中华龙就飞翔到哪里。从遥遥远古走到今天，作为一种标志，中华龙已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华人团结在龙的旗帜下，容合在同祖共宗、亲如兄弟般的大家庭中。中华龙文化的这种凝聚力，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上海学者叶尚志曾撰文，言其“到美国访问，凡是炎黄子孙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的根称为龙根，都在中国大陆”。“我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纽约，一进入华人家庭或聚会，一些朋友便不约而同地要我写‘龙的传人’、‘龙’、‘龙根’几种条幅，带的宣纸供不应求。时间不够用，只得通宵达旦急就草成。有一次我陪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访问了拉萨、喀什、乌鲁木齐、吐鲁番、呼和浩特等地，遍览祖国大好河山、民族风物，令他感慨万分，回去数月就出版一本厚厚的《龙的传人》游历记相赠。可见对龙的感情也就是对祖宗的感情，对祖国的感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古老渊源所在。”<sup>②</sup>

“弃龙”风波发生后，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龙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海外华人普遍认同的民族传统。如果改变这一历史传统，华侨们会缺少增进民族认同感的寄托，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sup>③</sup>

“随着历史的演进，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团结在龙的旗帜下，融合在同祖共宗、亲如兄弟般的大家庭中。中华龙文化的这种凝聚力，是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无法排除的，它将在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任何人都不能小看它。谁看不到这一点，就势必要犯大错误。倒行逆施者，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sup>④</sup>

注释：

①②《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③《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④ 阎云翔：《试论龙的研究》，香港九州学刊，1988年第2卷第2期。

⑤ 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⑥⑦《中国龙的新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⑧ 杨根乔：《论民族精神的新内涵》，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5日。

⑨ 杨德广：《伟大的民族精神引领成长》，文汇报，2004年5月27日。

⑩ 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⑪ 钱其琛：《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文化内涵》，人民日报，2000年4月3日。

⑫ 王东：《中国龙的新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第221页。

⑬ 曹继军等：《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光明日报12月5日。

⑭ 黄守愚：《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对远古猪灵崇拜的再认识》，红网，2006年7月1日。

⑮ 参阅《神话学会会长叶舒究中原解读“图腾”密码》，新华网河南频道，2006年8月15日。

⑯ 刘志雄、杨静荣二位先生经过研究后指出：元朝统治者“只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这实际等于对民间龙纹放行，这无疑是一种面对现实的让步”。“实际上，元以后的陶瓷器皿，宫廷所用者龙纹亦有三爪、四爪的，而民间所用者亦见有五爪龙的，只是数量不多而已。”（《龙与中国文化》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明代皇帝在重赏有功之臣时，又往往有‘蟒衣’之赐。所谓‘蟒衣’指的是少一爪的龙纹，而实际上有些蟒纹几乎与龙纹无异。”（同上，第283页）明洪武年间，画家盛著奉旨为南京天界寺影壁作画，他精心画了一幅《水母乘龙图》，不料朱元璋看到后大怒，认为此画是以“龙被女人所乘”来奚落、讽刺他这位“真龙天子”，遂以“不称旨”罪名，将盛著“弃市”。《明画录》、《画史绘要》、《嘉兴府志》等书均有对此事的记述——这是史籍有记的、笔者见到的因龙纹而被专制帝王处死的一例。

⑰《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5月3日。

⑱《龙年说龙》，文汇报，2000年2月25日。

⑲ 人民网，2006年12月17日。

⑳ 王海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保持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龙文化与民族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253页。

（责任编辑 康宁）